

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

知识与救世： 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

鱼宏亮 著

本书以“经世知识”为研究中心，使用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对中国学术史中的传统课题“经世之学”进行了研究。试图重构“经世之学”的知识背景，并进一步探讨其在古代文化中的来源及其流变。围绕“知识”这一核心概念，讨论了经学、史学、政治史、政治史与经学之关系的问题，就知识、学术、政治、社会等问题经世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

知识与救世：

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

鱼宏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鱼宏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

(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4118-2

I. 知… II. 鱼…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241 号

书 名: 知识与救世: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鱼宏亮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18-2/K · 05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6.75 印张 25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章	(1)
-----	-----

导 言

一 概念及时代	(1)
二 学术史回顾	(5)
三 几种趋势	(15)
四 本书的核心概念	(18)

第二章	(20)
-----	------

经世之学的源流

第一节 两种身份与知识传统	(20)
第二节 从理学到心学:帝国统治的危机	(31)
第三节 明末性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的 分野	(46)
第四节 晚明政治危机与学术论争	(59)
第五节 经世之学的确立:学科分类变化的考察	(67)

第三章	(81)
-----	------

经世之学的内容(一)

第一节 制度、沿革与职掌	(81)
第二节 实务与实政:财赋、兵农、河漕	(90)
第三节 音韵与训诂:挖掘圣贤本义的 利器	(98)
第四节 舆地之学与社会政治	(106)
第五节 礼学与道德人心的维系	(115)

目 录

第四章	(125)
· 经世之学的内容(二)	
第一节 经学即理学	(125)
第二节 政治主张:封建与郡县之辩	(136)
第三节 对明朝灭亡的反思	(147)
第四节 西学与经世之学	(157)
第五节 文献与对策:经世文的编纂	(170)
第五章	(178)
经世家学个案研究	
——以顾炎武为例	
第一节 顾氏家族出仕与家学特质	(178)
第二节 顾炎武早期的研习与学术经历	(186)
第三节 从明清之际的政治活动看 顾炎武的家学影响	(190)
第六章	(194)
实践与影响	
第一节 道统、学统、政统	(194)
第二节 启蒙的限度:以黄宗羲为例	(206)
第三节 遗民气节与重建纲常	(218)
第四节 清初的理学与清朝统治 合法性的确立	(229)
第七章	(239)
结语:从经世到考据	

目 录

附录一	(250)
参考文献	
附录二	(262)
顾炎武家族世系表	
后 记	(263)

【一 概念及时代】

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实为开端。其后的《汉书·艺文志》则开创了历代正史中著录书籍以及探讨学术源流的范例。因此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特点是以文献为基础,结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方法来进行的。传统古代学术史以儒学的发展演变作为主要线索,其他学科的研究都是以儒学发展史作为参照系而展开的。从儒学来说,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道、儒杂陈,隋唐佛、儒参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学术发展阶段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参考坐标。^①将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思潮作为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环节始于晚清时期学者的提倡,直到民国以来此一时期的学术和思想逐渐受到学者重视。

从时代范围来说,明亡以后学者多喜用“明季”一词指称晚明史事。根

^① 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比较有代表性,开启了近代学术史著作的范式。

据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所载,以“明季”为名的著作就有六十三种之多。^①但这些著作所反映的时代却并不确定,如顾炎武《明季实录》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陷落至福王朱由崧(1644—1645年在位)登基这一短暂时期的史事;^②而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则合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史迹;^③邹漪的《明季遗闻》则记崇祯二年(1631年)四月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的史事。^④可以看出,“明季”一词为清初士大夫所喜用,但并不专指某一确切的历史时期,其中含有著述者标识其明朝遗民身份的意思。

“明清之际”的用法,大体起源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张元济《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中有《明清之际名人传》一种^⑤;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则涵盖了“万历时代”、“崇祯朝”、“南明三朝”及清初“顺治、康熙间”,从1573年到1722年的历史时期^⑥;今人萧篱父认为“明清之际”指“从明嘉靖——万历至清乾隆——嘉庆时期”,亦“即公元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⑦。此则可以看出,“明清之际”的时期问题,学者大多根据各自所处理的文献的内容不同而各有所指,并没有确切范围。本文所述的“经世之学”,在知识的来源上上溯到秦汉时代,但经世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则开始于晚明至清初。此一时期的经世学者,多生活于1600年至1700年之间,所以本文讨论的“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主要是指代17世纪的学术范畴。^⑧但也应该考虑到知识、学术思想等概念和源流本身并不能以确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顾炎武:《明季实录》,《亭林先生遗书》,光绪十四年吴县校经山房刊本。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书从万历二十三年到崇祯十七年,后书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永历十四年。

④ 邹漪:《明季遗闻》,《昭代丛书》本。

⑤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附录第6页。

⑥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并参见其《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⑦ 萧篱父:《〈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序》,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⑧ 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将中国的近世划分为:理学时期——西历1050年至1600年,反理学时期——1600年至今日。这个划分也是基于明清之际学者的生活的大体年代来确定的。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5页。

定的历史时期来截然划分,所以这只是一个宽泛的描述,并不是严格的界定。这也是学术史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①

从学术特征来说,对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前贤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总结起来大体有如下若干种概括:

1. 反理学思潮。梁启超首倡此说,以明末清初之经世致用思潮为理学的反动。^②

2. 早期启蒙思潮。以侯外庐为代表,张岂之等学者都继承了这一观点。^③

3. 经世致用思潮。起源于晚清、民初,实际上是受梁氏影响提出的。

4. 实学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葛荣晋、陈鼓应等学者为代表的主张。^④

此外,尚有批判思潮(或者叫作“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批判思潮”、“地主阶级自救运动思想”)、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市民文学和市民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总结思潮等概括。^⑤

以上各种表述,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明清之际的学术特点进行了概括,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这一时期学术的思想性特点比较重视,对学术范畴、知识体系等问题重视不够。本书拟采用传统概念“经世之学”来概括明清之际的学术范畴和思想特点,一方面因为这一概念比较贴近此历史时期学者自身的理解和概括,另一方面在于能够揭示古代学术中知识体系的演变及其特征。本书所讲的“经世之学”,从“经世知识”的角度入手,将“经世知识”与儒家学说的两种知识来源——礼乐诗教与文史法律两套知识体系相联系,认为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的内容主要是对“经世”知识体系的概

① 参阅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一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2—3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到“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的五种对于理学反动的趋势,见是书第一章《反动与先驱》。钱穆虽然反对“反动”之说,但因为“以人系学”的研究特点,所以看不出明显地将明清之际的学术作为一个环节的主张。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

③ 以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为代表。

④ 以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编:《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为代表。

⑤ 参阅詹海云:《清初学术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括,这种知识体系就是儒家早期的文史、法律知识的延续。从先秦到秦汉士大夫与文法吏的身份区别到知识背景中礼乐教化与法律簿书的差异来阐述经世之学在早期学术的知识谱系中的地位和特点,是本书采用的一个重要视角。本书认为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即实用性的知识层面和思想主张层面,并将这两部分内容进行了初步概括。在此基础上,本书讨论了明清之际经世之学在晚明与清初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指出了经世学者思想主张的实质。本书采用的“经世之学”的概念,主要是希望摆脱传统学术史研究从学术思潮、学术风气、学术方法等入手的做法,从学术范畴的角度确立经世之学的地位,考察其知识基础的起源和演变。

儒家文化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系统,求知活动以及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固然与不同时代儒家伦理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宋明理学以来,格物致知成为认知天理的起点,那么关于人心、道德之外的典章、制度、万物的知识就具有了重要的地位。而阳明学则对通过琐碎知识而得到“破碎大道”的理学式方法给予批评,推动了明朝中后期注重心性、义理的思潮,而对外界知识的关注有所下降。但是,在任何一个王朝,关于统治本身所必需的各种实用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强调经世精神——却是必须并且不断发展的。这正是我要从古代寻找经世之学的知识谱系主要理由。“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在古代主要有两种意思,一为作为动词的知道、了解的意思,如“《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弗能知识而效天之所为云尔”^①。又如《后汉书》吴汉传:“二十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②所以,《玉篇》讲“知,识也”。另外一个用法,是作为名词,意思是相识的朋友。如《汉书》韦玄成传:“少好学,修父业,尤谦虚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③但是,宋明以来,常识理性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认知活动形成一种符合于常识类比和遵循常识逻辑(理性)的知识体系。^④知识一词在格物、穷

① 《春秋繁露》卷一二。

② 《后汉书》卷一八《吴盖陈臧列传》。

③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玄成》。

④ 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第105—157页。

理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如朱子说:“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务之中,因其所知之理而究之以各造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①又:“然非有以开其知识之真,则不能有以致其好恶之实。故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②格物致知所获得的知识成为道德判断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作为 Knowledge 的知识在宋明理学的修身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推而广之,古代囊括在“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的博物名目下的各种认识,都成了儒学知识体系中的内容。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使用“经世知识”作为研究对象,庶几可以成立。

【二 学术史回顾】

11 清代与民国

早在清初,学者就开始总结宋明以来的学术,对明清之际学者多有涉及。如黄宗羲《明儒学案》、全祖望续编《宋元学案》就涉及了多位明清之际的学者。但此时的重点在于表彰明末清初几位大儒的务实学风和经世精神,或者是从经学的角度确立清初大儒在经学(道学)发展谱系中的地位。^③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具体内容尚乏论及。此外,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之间互相走访、书信交流而对学术观点进行探讨、论争,通过大量尺牍、序、跋而表达对时代学术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清中叶起,随着清政府大力奖掖文化事业,学术史的研究蔚然成风。比如全祖望等人生活的年代去明清之际未远,精于该时期的史事和遗闻掌故,全祖望在其《鲒埼亭集》中撰写了不少学者的墓志碑铭,如著名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二曲先生窆石文》,同时还为大批清初

① 朱熹《四书或问》卷二。

② 同上。

③ 如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将经世大儒顾炎武、李颀编入“翼道学案”,将陆桴亭(世仪)编入“传道学案”之类的作法,反应了清人的学术史视野。见《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卷三,光绪四年刻本。

学者如傅山、毛奇龄、沈彤等人撰写了“墓志”、“事略”、“传记”等文。这些文献不但记述学者的生平事迹,而且就其学术特色、学术方法等进行全面而中肯地述评,成为我们研究明清之际学术史的重要史料。此后的杭世骏、钱大昕、彭绍升、阮元学者,在其文集《道古堂文集》、《潜研堂文集》、《二林居集》、《研经室集》中,也收录了许多明末清初学者如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人的学术传记。至乾隆朝,政府主持编修大规模的丛书《四库全书》,几乎网罗当时所有著名学者参与其事。丛书不仅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存世的文献,而且为每类书,甚至按照小目的分类为其撰写学术源流的序言。同时为每部著录的书撰写提要,就学术源流、作者生平、文献内容、学术得失、版本信息等方面作了确当而简明的交代。这些传记材料大多忠实可信,评价也比较公允得当,为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道咸以来,清朝统治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考据学的风气有所衰歇,士大夫呼吁关注现实问题,今文经学再度兴起,学术界汉宋之争亦显激烈。学者根据各自的学术背景对此前学术进行总结或者批评,如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方东树《汉学商兑》,阮元《皇清经解》,王先谦《续皇清经解》,稍后唐鉴《清学案小识》等著作,也对明清之际学术有较多探讨和反映。晚清民初赵尔巽主持编修《清史稿》,其中的《艺文志》、《儒林传》、《文苑传》等类目,以及徐世昌主持修纂《清儒学案》,都集中的讨论了清代的学术与文化。这些成果,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或者由于政治倾向和学术派别不同,品评存在一些偏颇,但总的来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观点,弥足珍贵。

民初,经晚清几十年中外学术思想的涤荡,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时代的学术。梁启超、钱穆、章太炎、胡适、鲁迅诸氏,学贯古今、识兼中西,其研究影响了近百年古代学术史研究的范式。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被当作从晚明心学向清代汉学转变的一个中间环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对清初经世学者以经学替换“理学”(经学即理学)加以注意,亦对经世精神的影响给以充分的肯定。“……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①钱穆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术史》亦将明清之际的学术作为一个单元来讲,使用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概括而名之以“东林学派”,论断多与梁氏不同。如梁氏以清初之学实为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钱氏则力辨“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所谓“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①。梁氏以顾炎武为清代考证学之第一人,钱氏则力辨考证之学实起于明代中叶杨慎、陈第诸人。明末的东林中人与“经世致用”学术实有密切关系,钱穆以“东林学风”来概括清初经世之学亦有本可据。但他没有就经世之学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而将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当作经学内部的一个转折。

梁、钱二氏对于明清之际学术的讨论具体结论多有不同,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普遍看法,且对后来的学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梁氏做清代学术史本来是为了给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后来由于“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因此梁氏对于明末清初学术的基本认识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对照,认为此时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一个貌似“复古”,实则“以复古为解放”的时代。因为这一预设,梁氏将明清之际经世之学中的一些内容和思想倾向都当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声。这个理论是后来启蒙说的发端。而钱穆以有清一代学术与宋学关系密切的看法,认为明清之际经世之学与宋明理学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开启了后来学术史上“内因说”(内在理路, inner logic)的思路。^②

此外,章太炎早年师从经学家俞樾,有深厚的经史考据知识,同时他又留学日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大量研习了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著作,以这两种知识背景的结合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取得了卓越成就。1900年出版、1904年修订再版的《馥书》,曾经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其《订孔》、《学变》、《学蛊》、《王学》、《清儒》诸篇,对古代学术和清代思想作了系统的清理和评价。比如关于文字狱与乾嘉学术的关系:“多忌,故诗歌文史枯;愚民,故先王经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说经,亦以纾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卷首,《自序》。

② 今人持“内因说”者,以余英时为代表。

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许多论述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其余如胡适等亦对清初学术作过专门研究,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卷二)、《费经虞与费密》(《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黄梨洲论学生运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卷二)等文。其中《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将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列为反理学的思想家,也是清初反理学思潮之论的代表。

梁、钱二氏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建立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两种重要范式。但是,由于时局的关系,民初的学术研究与时代表思潮关系很深。如章太炎论清学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②,与排满的思想有关。这一点应予以注意。^③另外,民初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经世学者都给予了注意,但都是对某个学者的学术倾向和思想进行研究,尚无以学术范畴来概括者,如张西堂《王船山的经世思想》、《颜李学派之实行的精神》、缪镇藩《顾炎武的经世思想》等论文。^④

再次,从内容上来说本时期经世之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明清之际经世学者强调的“严华夷之辨”作为经世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张西堂赞赏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王夫之说的“博爱之谓仁,但应有差等。夷夏之分,天下大防”是其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缪文中也将顾亭林的有关华夷之辨的内容当作其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既反映了明清之际经世学者所处政治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也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特点。因为民初有反满的思潮,此后有抗日的任务,所以学者们对明清之际经世之学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给予特别的关注。

要之,民国时期的明清之际学术史与经世之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大多继承梁、钱两家,且多注意于“经世致用”的学风,少及“经世”之学的内容,

① 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检论》卷四。

② 章太炎:《清儒》。

③ 钱穆亦如是,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并言写作此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这样,表彰民族气节,提倡经世致用,主张继承两宋“明道经世”的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就成了全书的主调。

④ 分别载于《经世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九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为此一时期特点。^①

12 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

上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对于明末社会发展状况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的理论。这个理论将明末清初的学术与思想称为“晚明社会进步思潮”、“早期启蒙思潮”或者“启蒙思潮”,认为晚明进步思潮有三个流派: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和自然科学派。学界明确地将明清之际的学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演化的一个独立环节,认为早期启蒙思潮的特点是:“对于道学作理论批判是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的重要课题”,其理论批判形式多种多样,如方以智运用自然科学,王夫之用唯物主义对道学、佛教、道教给予批判,黄宗羲和唐甄从政治思想方面抨击封建专制主义,顾炎武、颜习斋则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对抗道学的空虚玄远,傅青主则以古诸子学来反对道学。总的评价是:“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提倡实事、实学,重视对历史、地理、军事、经济以至泰西之学的研究,并强调把书本知识拿到实际生活中去检证,因此大多论证了行的重要。”“他们一般注重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并据此批判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这可说是这个时期社会思潮的共同倾向。”^②

亦有学者以“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有哪样的思想意识”、“不能将有影响的学派和思想简单化”^③为指导思想,对清代前期顾炎武、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和清初反理学思潮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在民国时期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学术史家如谢国桢、张舜徽等,则继续进行深入的材料发掘和考辨,谢国桢《黄梨洲学谱》、《顾亭林学记》、《明末清初的学风》等著作,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清人文集别录》、《清代笔记条辨》等著作,对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文献做了一些整理。

① 谢国桢等人对于明清之际的学风和顾亭林学术谱系的研究亦显示出此特点,如谢氏《明清之际的学风》、《顾亭林学谱》等著作。

② 侯外庐、张岂之等编:《中国思想史纲》;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

③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自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启蒙说”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等民初学者关于中国“文艺复兴”、“以复古为解放”的学说。对经世之学、乾嘉时期的汉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措意不够。近年学界亦开始反思套用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阶段和模式来比照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进程的理路。随着明末社会性质、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逐渐淡出学界视野,启蒙思潮的说法受到怀疑。关于明清之际经世之学的内容、性质、学者的思想倾向等问题又重新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于经世之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都有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需要。所以“启蒙说”实际上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

1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20 世纪 80 年代,专门研究清代历史的机构和学术刊物大量出现,清史学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学界深化有关专题创造了学术氛围。杨向奎撰多卷本《清儒学案新编》,从孙奇逢起,至康有为终,以“清初”、“乾嘉”、“嘉道”、“晚清诸儒”为阶段,以学者个案为主体,选辑材料与思想讨论相结合,目的是“盖欲起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的双重作用”^①,促进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另外如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冯天瑜《明清文化散论》,萧蓬父《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吴雁南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王政尧《黄宗羲》等,从各个方面对清代、清初学术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海外学者对明清学术、思想问题的研究值得关注。台湾中研院有关机构召开清代经学、近世经世思想专门研讨会,对近百年来有关清代学术和古代经世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和反思,并且讨论了若干有启发性的研究个案与方法,尤其反思了对传统乾嘉学术研究的不足,提出“乾嘉义理学”等学术领域,对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模式转换起到

^①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缘起》,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第 3 页。

了推动作用。^①

此外,欧美地区的中国研究,随着对以费正清和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海外中国学范式的反思,出现了多部以中国历史内部因素的发展为关照点的专著。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主张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China-centered approach*),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多学科协作。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和《经学、政治、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派研究》(*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等作品,注重处理学术文献,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从传统学术史以经学史代替学术史的视野中摆脱出来,注重文献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对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书院、书籍印刷流通、藏书楼、学者的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涉及广泛的学术、学人、学制等的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传统学术史很少重视的一大批材料进入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包括目录、类书、丛书编撰、考古文物、图片、古代蒙学教材等材料,有助于学界深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和知识背景

余英时等学术名家,发展了民国学术传统,着力于探究明清学术变迁的“内部因素”,认为从心学到考据,抑或从理学到汉学,其演变原因都在于学术自身逻辑(*inner logic*),注重考察内部观念与外在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其《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②、《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等作品都发展了这个思想。海外学者的方法和理论,对当前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

① 1984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以及1993年中国文哲研究所“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分别出版有《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考载于前者的张灏、刘广京,载于后者的张寿安、林庆彰各文。

② 分别载有《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清代“经世致用”》观念等论文。